

● 陈必祥 ● 主编 ●

中国现代
语文教育
发展史

张志公题

云南教育出版社

中国现代语文教育发展史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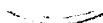
主编 陈必祥

编委(以姓氏笔划为序)

王华敏 李杏保

顾黄初 谈彦廷

欧阳汝颖



云南教育出版社

614199

责任编辑：晁世新

封面设计：李惠明

中国现代语文教育发展史

陈必祥 主 编

•

云南教育出版社

（昆明市书林街100号）

昆明益民装订印刷厂印装 云南省新华书店发行

•

开本：850×1168 1/32 印张：13.5 字数：340,000

1987年5月第一版 1987年5月第一次印刷

印数：1—3,500

统一书号：7468·76 定价：2.30元

ISBN 7—5415—0069—0/G·66

编撰者：

陈必祥：绪论第六章；

李杏保：第一章、第八章第一、第二节；

苏浙生：第二章；

王华敏：第三章；

顾黄初：第四章；

胡鸿飞：第五章；

谈彦廷：第七章、第九章；

周寿仁：第八章、第三、四、五节；

陈碧秋：第十章；

附 录：

〔香港〕欧阳汝颖：香港语文教育发展概述。

序

陈必祥等同志编著的《中国现代语文教育发展史》，展示了近百年来我国语文教育演变的轨迹，为我们在新时期承继、变革和超越中国固有的语文教育传统提供了认识上的依据。

近百年来的中国史是积贫积弱的中华民族变革图强、寻求现代化之途的历史。社会每前进一步，都把传统与反传统的论争推到思想文化领域的前沿。随着改革和开放的进展，近年来我国思想界掀起了对传统文化进行反思和再评价的热潮，语文教育领域也出现了对传统教育种种不同的看法。

时代的进程已经显示，我们无法抛弃传统，另找一个全新的文化生存空间；也不能维持传统，在封闭和凝固的精神氛围中建设现代文明。区分精华与糟粕曾经被看作是对待传统的正确态度，但它的偏颇同样是显而易见的。因为传统并非历史隧洞里的堆积物，只要穿穴爬梳即可予取予舍。作为我们久远的民族历史铸造的民族心理——文化的深层结构，它无法抛弃、维持或分割，只能在外来文化因素和现代文化因素的吸引与冲击下重建，对原来的格局和特质进行更新改造。以这样的观点来审视我国语文教育发展的历史，就需要从整体和深层把握传统语文教育的特点，使之在新的条件下发生创造性的转化。

要认识传统语文教育的特点，不能不联系中国古代的整个文化背景。我国古代的“治道”，特别注重“教化”。“建国君民，教学为先”。教育在封建社会中有着特殊重要的地位，而它的内容就智育而言主要是语文教育。因此，我国古代的语文教育十分鲜明而又充分地体现了传统文化的个性。正如研究中国文化的学者所指出的那样，中国古文化是以“求善”为目标的“伦理型文化”，而不同于希腊古文化是“求真”为目标的“科学型

文化”。儒家的伦理中心主义影响社会意识形态的各个方面，也给语文教育打上了深深的烙印。

“载道”，是传统语文教育观的教学要求。这种观念确认语言文字的载体性质，十分强调它特定的社会功能，在一定意义上已经逼近作为社会交际手段的语文的本质特性。在西方，长期以来把语言文字看作是纯粹的符号系统，直到现代语言学兴起，才逐步改变了那种忽视语义内容和交际过程的倾向。但“文以载道”的“道”不是现代意义的社会信息，而是儒家的道统以及由此推导出来的儒家的政治信条。这就是把语文教育当作封建教化的工具，排斥除此之外的一切思想内容和生活内容。我国传统的语文教育高度伦理化、政治化，以至完全成为经学和科举的附庸，最终割断了语文与社会生活丰富的、多方面的联系。五四新文化运动猛烈地批判了以“读经”、“解经”为主要内容的封建教育，用“言之有物”来代替“文以载道”，提出做文章要“直写自己头脑里的思想，或直叙外面的事物”。这种观念更新，把语文教育从儒家经典中解放出来，体现了科学与民主的精神，也使语文回归到了它的自身。

“启发”，是传统语文教育观的教学原则。这一原则着眼于引发矛盾，开启思路，诱导教育对象积极主动地思考问题、获取知识，体现了以学生为认识主体的人本思想。从反对“灌”“注”“填”，提倡积极思维的角度看，它与现代教学论的精神颇有相通之处。但儒家的人本思想在于“克己”“自律”以求得人际关系的和谐和社会秩序的稳定，与西方近代人文主义尊重个人的价值和自由发展很不相同。在这种文化背景下的教学启发原则，在于引导学生领悟已有的知识，并不鼓励他们在未知的领域突破和创新。这样就可能使学生因循守旧，缺乏开拓创新的能力，它与发展的教育观是相违的。《礼记·学记》中有这样一段话：“故君子之教，喻也。道而弗牵，强而弗抑，开而弗达。道而弗牵则和，强而弗抑则易，开而弗达则思，和易以思，可谓善喻矣！”这里的“和易以思”，只是对于儒家伦理观念和政治原则的求同思维，与以积极的求异性

为特征的创造性思维有着明显的区别。从《论语》所反映的孔子的教育实践看，他使用的主要是譬喻联想、举一反三、触类旁通等原型启发，思维的起点和终点都在同一方向和层次上，未能引出独特的发现和独到的见解。这种教学原则，致力于活跃思维，但在总体上又很容易禁锢思想。它无法从根本上划清被动接受和主动探索的界限，最终会走到“灌”、“注”、“填”的路上，把学生培养成思想僵化、恪守封建伦理纲常的庸儒，因而理所当然地受到富于进取精神的五四新思潮的抨击。

“涵泳”，是传统语文教育观的教学方式。我国古代的语文教育，注意对文章的整体把握，认为只要反复讽诵，潜心涵泳，即可明达文义。所谓“读书百遍，其义自见”、“熟读唐诗三百首，不会吟诗也会吟”，就是这个意思。这种教学方式体现了伦理型文化朴素的整体观念和直觉体悟的思维方式。它把综合作为认识的起点和归宿，避免人为分割所造成的认识局限，在这个意义上可以说已经包孕着现代系统观的雏形。重视语感的培养，以此作为提高语文能力的基础，这也是符合语文学习的规律的。但这种整体性的思维方式，没有分析这个不可或缺的中介，不能全面把握各个侧面、部分、层次之间的联系，因而它的总体认识必然是模糊、残缺和肤浅的。对于一篇文章来说，横向不了解它的各个构成因素，纵向不了解它的各个发展步骤，就很难深入理解它的内在含义。对于整个学习过程来说，盲目地“一篇篇读，一篇篇写”，处于无序状态的“多读多写”，必然会造成许多无效劳动。没有语文知识分类科学的帮助，满足于涵泳所取得的经验理性，正是传统语文教育效率不高的原因之一。五四运动前后，语文教育改革的前驱，吸取西方近代科学的分析方法，并将当时国外的语音、词汇、语法、文字、修辞、逻辑等学科的成果，引进汉语汉文的教学，从而使我国的语文教育大大前进了一步。

以“载道”、“启发”、“涵泳”为主要支点的传统的语文教育观，确是一个错综复杂的矛盾体——它既强调语文特定的社

会功能，又割裂语文与社会生活丰富的、多方面的联系；既鼓励学生的积极思维，又抑制他们的生气勃勃的创造精神；既注重知识的整体性把握，又未能借助分析达到科学的综合。对于这种相互对立又彼此依存的观念系统，全盘肯定，全盘否定，或者机械分割，寻章摘句地判定孰为精华、孰为糟粕，显然都是不可取的。毫无疑问，只有在准确把握的基础上对它更新改造，才能使它适应我们今天语文教育的需要。

由于历史的种种原因，我国社会的近代化（或称前现代化）很不充分和完备，语文教育的传统规范一直束缚着我们语文教育思想的发展。建国以来语文教育中存在“为政治服务”、“满堂灌”、“学生负担过重”等倾向，在很大程度上与封建教育的影响有关。新时期我国的语文教育事业蓬勃发展，开始了一个令人欣喜的全面改革、广泛实验的新阶段。应当承认，这种改革和实验是在缺乏足够的理论准备的情况下进行的。或许是因为起步较早，或许是因为自觉意识不够，我们未能充分吸收现代哲学、语言学、心理学、教育学和文学理论的成果，更新自己的知识结构和思维方式，改造长期以来形成的语文教育理论的语汇系统、参照系统以及观念系统。正是因为没有找到新的逻辑起点，我们的改革和实验虽然取得不少成绩，但总的看来效果并不显著，有的甚至到了难以为继的地步。事实证明，加强理论意识，确立现代的语文教育观已经是刻不容缓的事了。这中间，对我国语文教育的传统进行反思和再评价，是一项必不可少的工作。

有一种情况是值得深思的。一些注重学习和运用传统语文教育经验的教师，教学效果相对要好一些；一些主张对传统进行根本改造，提出全新的语文教学体系的教师，实验的结束却大多并不令人满意。这里的原因当然是多种多样的，但主要的是这些同志构筑的教学体系本身缺乏合理性。它们的通病是离开具体的表达内容，孤立地进行语文训练；违背特定的教育原则，片面地追求教法翻新；割裂整体的有机联系，机械地分解教学步骤。这是

纠正传统长于综合、忽视分析的倾向时出现的另一种偏颇，带有明显的形而上学的特征。人们好象回到培根、洛克的时代，重新举起实验科学的“新工具”，作为对古代传统的一种反叛。他们认为传统必须根本改造，这是完全正确的；对于语文因素进行条分缕析，也是很有认识价值的。但在思辨方式上主要是以近代的分析科学，而并不是以现代的系统科学作为武器，缺少整体观念和综合方法，因而在实践中产生某些迷误。与经济、政治和其他文化领域的情况相仿，或许在我国语文教育现代化的过程中也需要补近代文明的课，这种情况的出现可能是一种暂时而又正常的现象。但无论怎么说，我们还是难以对它作语文教育现代化、科学化的认同。

看来，我们需要对传统的语文教育有更为清醒、更为自觉的认识；反对传统教育的伦理化、政治化，不是为了否定语文作为载体的性质，而是为了加强语文与社会生活丰富的、多方面的联系；反对传统教育的禁锢思想，不是为了摒弃它的一些有效的教学方法，而是为了培养学生的开拓创新能力；批评传统教育缺少科学分析，不是为了排斥它的整体观念，而是为了用现代系统观作指导来建立新的语文教学体系。这里，一个带根本性的问题是如何分清古代系统观点的综合方法与现代系统理论的综合方法的界限，区别近代实验科学的分析方法与现代系统科学的分析方法的不同。语文教改的根本目的就是要改变古代综合方法的直观性和模糊性，避免近代的分析方法的孤立、静止、片面的弊端，在静态与动态、内部与外部、整体与局部、局部与局部的有机联系中来把握语文教育的规律，使我国传统的语文教育在现代条件下发生创造性的转化。这样来认识和改造传统，是不是能使我们的语文教育改革和实验得到更加健康的发展呢？

认识和改造传统需要回顾全部历史。正是因为这个原因，我十分赞赏陈必祥等同志的这项开创性的工作，并且热诚地向从事语文教育理论工作和实际工作的朋友推荐这部书。

张 春 林

目 录

绪 论	(1)
-----------	-------

第一章 清末民初的语文教育	(10)
---------------------	--------

第一节 废科举,兴学校,国文科应运而生	(10)
---------------------------	--------

第二节 从《蒙学课本》到《国文》 早期语文教科书的演进	(18)
--------------------------------------	--------

第三节 白话文运动对“国语”教育的推动	(29)
---------------------------	--------

第四节 国文教授法专门研究的兴起	(34)
------------------------	--------

第二章 五四时期和二十年代的语文教育	(42)
--------------------------	--------

第一节 新文化运动和语文教学	(42)
----------------------	--------

第二节 新学制的颁布和语文教学	(46)
-----------------------	--------

第三节 国语课课程纲要	(51)
-------------------	--------

第四节 语文教材的变化	(55)
-------------------	--------

第五节 教授法探讨	(61)
-----------------	--------

第六节 语文教育家的理论和实践	(76)
-----------------------	--------

第三章 三十年代语文教育	(88)
--------------------	--------

第一节 中小学语文课程标准	(88)
---------------------	--------

第二节 比较流行的中小学语文教材	(93)
------------------------	--------

第三节 几部语文教学法著作	(103)
---------------------	---------

第四节 语文教育家的理论和实践	(113)
-----------------------	---------

二 第四章	四十年代的语文教育	(132)
第一节	历史转折年代的语文教育	(132)
第二节	几次重要的讨论	(134)
第三节	语文教科书的编制和使用	(146)
第四节	语文教材教法研究的阵地和成果	(164)
第五节	语文教育家的理论著述	(170)
二 第五章	老解放区的语文教育	(187)
第一节	教育概况	(187)
第二节	语文教材	(190)
第三节	语文教学方法的革新	(204)
第四节	语文教育家的理论和实践	(213)
二 第六章	建国之初至五十年代中期的语文教育	(217)
第一节	语文教育的初步改革	(217)
第二节	开展关于《红领巾》观摩教学的讨论	(224)
第三节	推行中学汉语、文学分科教学	(228)
二 第七章	“大跃进”时期的语文教育	(238)
第一节	语文教学的偏向	(238)
第二节	语文教材	(239)
第三节	讲读教学和作文教学的方法	(243)
第四节	关于扫盲运动	(248)
二 第八章	国民经济调整时期的语文教育	(250)
第一节	正视语文水平下降实际， 切实提高语文教学质量	(250)
第二节	重视语文学科的特点， 明确语文教学的目的和任务	(253)

第三节	《全日制中学语文教学大纲(草案)》的颁布 和全日制中小学语文教材的修订·····	(259)
第四节	反复实验, 不断改进教学方法·····	(265)
第五节	语文教育家的理论和实践·····	(274)
第九章	“十年动乱”时期的语文教育·····	(286)
第一节	语文教材·····	(286)
第二节	课外阅读和作文教学·····	(293)
第三节	语文教学方法·····	(295)
第十章	新时期的语文教育·····	(298)
第一节	语文教学大纲·····	(298)
第二节	语文教材改革·····	(303)
第三节	语文教学改革的发展趋势·····	(314)
附录		
	〔香港〕语文教育发展概述·····	(315)

绪 论

我国语文教育的历史源远流长。一般说来,语文教育的发端,是从文字的产生开始的,而语文教育最初的基本的内容,就是学习和使用文字。汉字是世界上历史最悠久的文字之一,汉字何时产生,现在说法不一,如果从甲骨文算起,到现在也有三千多年的历史了。甲骨卜辞中就有“教”、“学”、“师”等字,可见,在甲骨文时代,已经有了“教”和“学”的活动,其中也必然包含着文字的学习和传授。我国学校出现得也很早。传说五帝时代就有了名叫“成均”的“大学”;到虞夏时代开始有“养”和“序”之类的学校;西周有“国学”和“乡学”;春秋战国时代,官学衰落,私学兴起;唐宋以后,不仅有官学、私学,书院制度也得到很大发展。无论官学、私学,还是书院,尽管教学内容不完全相同,但有一个共同点,即都很重视语言文字的传习,尤其重视童蒙教育。这是由于我国长期使用的是方块汉字,古代文化典籍又都是用文言文写成的。汉字的繁难和文言文的艰深,使得语言文字学习成了教育中的一大难关。为了突破这一难关,任何一个受教育者,不得不在这方面花费大量的精力,消磨许多时日。这就是我国封建教育中特别重视语文基础教育的一个重要原因。

但是,古代的语文教育,从来没有专门设立“语文”一科,古代各类学校教育的内容主要是研习儒家经典,《四书》、《五经》是其基本教材,语文仅仅是读经的工具和手段。唐宋以后,由于科举制度的盛行,语文教育又受到科举的制约和影响。尽管如此,由于语文教育在整个封建教育中的地位和作用,由于千百年语文教育内容的连贯性和延续性,在这方面,前人也给我们留下了许多宝贵遗产。例如,古代著名教育家孔子提倡启发诱导,因材

施教；孟子主张专心有恒，循序渐进；韩愈强调学必有师，“文以载道”；朱熹提出“熟读精思”，“虚心涵泳”；王夫之赞成学思并重，学思结合等等；这些直到今天，对我们语文教育仍有启发作用。又如，从秦代开始，我国就出现了专门教授童子的《仓颉篇》、《爰历篇》等识字课本，唐宋以后，又出现了《三字经》、《百家姓》、《千字文》等流传久远的语文启蒙教材和《昭明文选》、《古文观止》等家喻户晓的著名语文选本。这些对我们今天的语文教育，尤其是教材建设，仍有一定的参考价值。

总之，古代的语文教育遗产中有不少珍品，有待我们去深入地开采、发掘、研究、总结。但是，正如前面所说，古代语文教育，基本上是经学和科举的附庸，其使用的教材是经史古文，同我们今天的语文教育的要求已经相去甚远。这就给我们提出了一个课题，总结我国语文教育的历史经验，不仅要重视研究古代的语文教育，尤其要重视研究现代和当代的语文教育。现代语文教育的历史，基本上是白话文的教育历史，同我们今天的语文教育有着更直接更紧密的联系。然而，正是在这方面，我们过去注意得很少，研究得很少，甚至资料也很难搜集。这就给我们研究工作带来了很大困难。

那么，现代语文教育从何时开始呢？我们知道，自1840年鸦片战争以后，中国一步步地变成了半殖民地半封建的社会，民族的危亡与社会的矛盾，激起一大批文人学士对旧教育的空疏和科举制度的腐败的极大不满，废科举，兴学校，成为不可抗拒的历史潮流。1903年，清政府在洋务派办学堂的基础上，公布了张之洞提出的“学堂章程”，这就产生了中国近代教育史上第一个比较完备的学校体系——癸卯学制。随着新学制的颁布，具有语文学科特点的“中国文学”一科才应运而生，从而为中国具有科学意义的语文教育揭开了序幕。因此，我国语文教育作为一门独立学科的历史应该是从清末新学制的颁布开始的。

从1903年语文教学单独设科到现在，已经有八十多年历史

了。语文教育的发展和演变，走过了一段艰难曲折的里程。

从1903年语文单独设科至五四运动前后，这是一个由传统语文教育向现代新语文教育逐步转变的时代。一方面语文学科与科举时代的读经讲经仍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儒家经典仍占据语文教学的重要地位；另一方面，语文学科毕竟逐渐从经学、史学、哲学等学科中分化出来，有了自己的教学目的，出现了我国现代教育史上第一批语文教科书，如南洋公学的《蒙学课本》，商务印书馆的《中学堂国文教科书》、中华书局的《新中华教科书》等。这些教科书都不同程度地打破旧式蒙学教材的格局，在内容和体制上都有所创新。此外，教育界的一些有志之士，在向西方寻找真理的同时，也引进了一些国外教育学、心理学和教授法理论，对我国语文教育也产生了影响。但是，由于古老的旧式教育影响太深，积习难返，加之还缺少真正科学教育思想作指导，语文教学基本上还没有摆脱“讲经读经”、“讲古文，写文言”的局面，且教学方法仍很陈旧，有的还在沿袭八股时代学作破题承题的老例。

从“五四”运动至解放前，这一时期是我国从旧民主主义革命转向新民主主义革命的时期。这是一个充满着复杂矛盾和斗争的时代。反映在语文教学上，其突出表现就是文言与白话之争。“五四”运动以前，语文教材基本都是经史古文，“五四”以后国文科改为国语科，白话文逐步进入语文教材，但由于习惯势力的影响，很多学校与教师认为白话文一看就懂，不必教，也无法教，仍旧眷恋于文言“国文”。因此，相当一段时间，“国文”与“国语”并存。只有老解放区白话文才占有绝对的统治地位。反映在教学方法上，许多教师还习惯于过去私塾先生教古文的那一套，即用枯燥烦琐的逐句讲解来代替学生的独立钻研与思考，所谓语文课，就是“新书一册，先生讲，学生听”，除了解释字词的意义，说明成语典故的来历，或者把书面的文句译成口头的语言以外，别无其他工作。尽管如此，白话文代替文言文这已经是不可逆转的趋势，作为现代语文教育重要标志的白话文教学终于成为语文教育改革的中心议

题。这不能不说是语文教育史上的一个带有根本性的变革。

为了探索白话文教学的道路,语文教育界如叶圣陶、夏丏尊、朱自清、黎锦熙等先驱者,在新思想、新潮流的影响下,勇于改革,大胆创新,孜孜不倦,艰苦求索,从理论和实践上对现代语文教育改革作出了杰出贡献。叶圣陶从“五四”时期开始,以现代教育理论为指导,对语文教育的一系列问题,进行了深入的思考和研究,提出了许多卓越的见解,其中,关于“语文是工具”的观点,关于“听说读写并重”的观点,关于“养成良好语文习惯”的观点,关于“语文课应是训练课”的观点,关于“给语文教材以科学性”的观点,关于“教是为了不需要教”的观点,关于“作文与做人”的观点等等,直至今日,仍闪烁着其思想光辉,对我们语文教学仍具有指导意义。

这里,应该指出的是,从三十年代到解放前夕,随着革命形势的发展,我国出现了国统区教育和解放区教育的两种截然不同的教育制度。老解放区语文教育无论是内容和方法都有其鲜明的特点,对我国解放后的语文教学有着直接的多方面的影响。对于老解放区的语文教育经验,我们应该进行全面深入的研究和总结。

建国初期至“十年动乱”,我国语文教育既有前进,又有曲折和反复。建国初期,党和政府对语文教育工作十分重视,为语文教学改革创造了良好条件。全国使用了统一的语文教材,建立了各种教学研究组织,教师队伍也发生了很大变化,语文教育一度出现了崭新的面貌。但是,由于种种原因,语文教育在前进中又出现了多次的反复。建国以后,人们对旧式的语文教学方法极为不满,迫切希望改革。在“学苏联”的热潮中,开展了关于“《红领巾》教学问题”的讨论,于是,语文教学一度盛行文学分析的方法;随后,1956年开始实行汉语、文学分科教学,这是一次有计划有领导的大规模的语文教改试验。但由于政治运动等原因,终于半途夭折;其后,在“大跃进”的年代,语文教学的正常秩序被打破

了，语文课几乎完全纳入了政治运动的轨道；随着国民经济的调整，语文教育逐步得到恢复和发展，广大教育工作者开始扎扎实实地进行改革试验，并取得了一批可喜的成果；然而，由于“十年动乱”，语文教育又遭到严重破坏，全国通用的中小学教材被废除了，语文课变成了大批判课，许多语文教师遭受残酷打击和迫害，语文教育质量严重下降。这是建国以后，语文教育领域的一次最大的反复。这一沉痛教训应该永远记取。

打倒“四人帮”以后，特别是“三中全会”以来，随着教育领域的拨乱反正，语文教育工作又逐步得到恢复和发展。新的《全日制十年制学校中学语文教学大纲》和相应的教材在全国推行，这对于统一认识，稳定教学秩序，保证教学质量起到了重要作用。与此同时，各种语文教学研究机构、学会、各类语文教育刊物如雨后春笋般地涌现。广大语文教育工作者，解放思想，勇于探索，大胆创新，无论在理论研究和教改实践上都出现了生动活泼的局面。语文教育终于迎来了美好的春天。

纵观语文教育近一个世纪以来的发展道路，正反两方面的经验都清楚地告诉我们，语文教育是一门科学，凡是科学的东西，都是有规律可循的。人们的认识和实践，凡是尊重科学，符合或接近客观规律的，语文教育便会收到成效，得到发展；凡是违背客观规律的，语文教育工作便会受到破坏和挫折。语文教育改革的过程，实际上就是探求语文教学客观规律，以及如何使我们的认识和实践符合这些规律的过程。

譬如，关于语文学科的性质问题，从语文单独设科以后，一直争论不休，反复很大。但是不管怎么争论，有多少反复，违反客观规律，最后都要受到惩罚。四十年代，在国民党统治区，国民党政府对语文教育实行思想控制，热衷于推行所谓“党纪教育”，强迫学生颂读那些党国要人推行专制政治的说教文章，妄图使语文课成为他们的“道德训练”课，这种倒行逆施，激起教育界普遍不满和抵制，最后终于彻底失败；在老解放区和建国以后，我们